

世界市场上的中国面孔：他们要买下世界吗？

一些中国人正以自己的方式撩拨世人的神经。他们在海外市场上甩出的大把钞票，让外国人一次次瞪大双眼。

3月26日，在法国南部城市图卢兹，正在拍卖的乾隆玉玺和清朝宫廷画精品《乾隆大阅图》第四卷《行阵》，均被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买家拍走。据法国媒体报道，乾隆玉玺被中国买家以1240万欧元的高价拍走，刷新了印章类拍品价格的世界纪录。《行阵》更是拍出2205万欧元高价，刷新了亚洲艺术品在法国的拍卖纪录。国人这种一掷千金的派头，近年并不鲜闻，再加上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，一些海外媒体甚至发出了“中国正在购买世界”的惊呼。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，一份在27个国家28000人当中进行的调查显示，这些国家的公众对中国经济实力的担忧正逐步增加。这些担忧主要存在于中国的一些关键贸易伙伴国中，在富裕国家尤其显著。

“中国梦”与“中国口味”

多年来，中国经济跨越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：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、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、头号出口国和全球第一的制造大国。对此，西方人可谓爱恨交织。但除了担忧，他们也很清楚，中国人越来越鼓的钱包，似乎意味着不可限量的游动资本和投资冲动。

中国人的老朋友、美国芝加哥市长理查德·戴利对这些资本早已充满期待。2011年3月18日到30日，戴利一直奔走于北京、天津、杭州、重庆和香港5大中国城市中。

他在芝加哥市长任上，已经干了22年，将在今年5月卸任。而他一直有一个未曾实现的梦想——从芝加哥市区修一条通往奥黑尔机场的高速铁路。

但芝加哥市政府的现状，让戴利无法实现他的梦想。在他治下的这座城市，经济已显萧条，市政府的财政也出现危机。

“我现在的理想在中国。”出发前，市长在当地媒体上高调宣称。他要带着芝加哥市的商业领袖们，到中国寻找投资，以带给芝加哥市新的“机会”。美国的媒体也将戴利此行，比喻为芝加哥市长追逐他的“中国梦”。

在北京，戴利坦率地告诉新老朋友们，中国经济崛起所显示出来的巨大潜力，已经激起美国各个州市的极大兴趣，“扩展我们与中国的联系，采取行动正逢其时”。

就在戴利乘坐汽车，前往各地的讲台发表演讲，向中国推介芝加哥市时，一些顶级汽车制造商，已经将中国客户的脾性摸得一清二楚。

3月28日，英国《金融时报》报道，中国继德国和美国之后，成为奔驰公司的第三大市场，并且是其顶级旗舰车型——S级轿车的最大市场。而去年，奔驰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单位销量增长了115%。

他们也比芝加哥市长更早地将目光投向了



奢侈品牌纷纷抢占中国市场。(资料图片)

中国富人的腰包。去年，该公司甚至用飞机运送了100位中国客户到德国和美国洛杉矶，为他们即将生产的豪华汽车的外部涂饰与内部功能提意见。最终，他们得出答案，“中国客户偏好最大、最昂贵的车型”。

这些汽车制造商们的细心程度，恐怕超出很多人的想象。大众公司在设计生产奥迪Q5时，加入了温控杯架，因为他们发现，“中国客户走到哪儿都喜欢带着茶杯”。而通用汽车在设计新车型时，也专门为中国客户设计了宽敞、舒适的后座空间。加长车身并把后座设计得更舒适，也是这些制造商为中国客户设计豪华汽车时的共同特点，因为“中国的有钱人一般都让专职司机开车”。

中国客户的这些特殊癖好，已经对汽车制造商的生产设计产生影响，不过，有分析指出，这种影响暂时还停留在车型的配置及涂饰上，在未来，中国客户可能会更关注汽车的驱动速度，这将会影响汽车的核心技术。

中国人对速度的追求，也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无法忽视。令戴利市长一直印象深刻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。而这次中国之行，让他吃惊的，是中国高铁的发展速度以及中国高速铁路列车前进的速度。

3月23日，从北京到天津访问时，戴利特意选择乘坐京津高铁。在天津匆匆7个小时的行程结束后，这位欣然接受了天津市“荣誉市民”称号的市长坦言，高铁留给他的印象最深。

芝加哥市长坐在乘客座位上，看着景物飞一般掠过车窗，感叹道：“安静、高速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”

世界市场上的中国面孔

通过在几大城市的访问，已是第5次到中国访问的戴利，再次看到崭新的中国面孔。

而在世界各地的各种奢侈品市场上，人们也见到了一些“不可思议”的中国面孔。

图卢兹的高价拍卖事件，再次将人们的视线拉回4个多月前。那时，中国艺术品创造了亚洲艺术品拍卖的世界纪录，而买家则是中国上海的一名企业家。

2010年11月，在英国伦敦郊外的一场小型拍卖会上，一件清乾隆粉彩镂空瓷瓶被这名中国企业家以折合人民币约5.5亿元的天价拍走。这超过估价36倍，也打破了此前黄庭坚书法《砥柱铭》以4.3亿元人民币创下的中国艺术品拍卖纪录。

中国艺术品价格的飙升速度，令外国人咋舌，中国富人们出手之阔绰，也引起了海内外关注。

当时，《金融时报》记者史提夫·文森撰文称，天价花瓶背后是国人的“瓷器爱国主义”。在他看来，中国的一些富人们，正带着爱国主义情结，急切地想带回本国文化遗产。这种“瓷器爱国主义”，当时在中国国内也引起广泛讨论。不过，不少人将这种“爱国主义”，看做是“美丽的花瓶”和“浮云”。

那件花瓶至今还引人关注，因为4个多月过去了，这位中国买家尚未付款。

但这桩悬而未决的大笔生意，似乎并未影响外国人对中国艺术品消费能力的判断。前不久出炉的《2010年全球艺术品市场：危机和复苏》报告称，中国在2010年已经超过英国，成为世界第二大艺术品和古董市场。

这份报告由欧洲艺术品基金会委托撰写。报告指出，由于去年富有的中国买家数量剧增，艺术品市场的价格也随之飙升。报告同时还指出，很多国家的奢侈品市场在2009年萎缩，但由于中国消费者的拉动，又在2010年开始出现复苏迹象。

在巴黎、拉斯维加斯，甚至在香港的奢侈品店门口，人们时常会发现排队购买奢侈品的中国面孔。据报道，仅在2011年春节，就有多达

5000名中国游客到拉斯维加斯的梅西百货购物，其中800名游客来自北京和广州，他们年收入在20万到100万人民币不等。

“这仅仅是开始。”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文化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喻文益如此评价道。在他看来，目前中国人均收入在世界排名还不高，只有少数中国人在进行高端产品消费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，中国人对奢侈品的购买能力，将会在世界产生更大影响。

几乎在欧洲艺术品基金会发布报告的同一时间，知名咨询机构麦肯锡也发布了自己的一份报告，并作出类似的预测。他们认为，中国消费者在奢侈品上的支出，每年将以18%的速度增长，2015年将达到270亿美元左右。这意味着，中国的奢侈品市场规模那时将超过日本，位居世界第一。

这份报告也指出，中国富人与西方富人有天壤之别，中国富豪要比外国富豪年轻15岁，他们每笔交易的金额也更大。

对于这一点，伦敦的房地产商人感受更深。据英国媒体报道，最新研究显示，在伦敦市中心高端房地产市场，来自中国内地的买家去年在购买最昂贵住宅方面，超过了俄罗斯人，成为花钱最多的人。截至2011年2月，在过去的12个月时间里，中国内地买家在高端房地产方面的平均开支为650万英镑，中国香港的投资者则列第三位，平均花费是550万英镑。

这些中国买家尤其对面对海德公园、地处梅费尔区或玛丽勒地区以及波特兰街花园广场的房子感兴趣。他们的购房预算在800万到1500万英镑不等，并且已有中国买家以1175万英镑和2575万英镑的价格，购买了圣詹姆斯区的两处房产。

供职于北京一家公司的陈忆，专门从事海外投资置业的房地产营销代理业务，其业务重心是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国的顶级滨海物业。在开展业务初期，陈忆发现，在澳大利亚置业的中国家庭，多是为了移民或留学，一般比较喜欢买公寓，房价算下来跟北京和上海差不多。但投资几年，在澳大利亚购房的人呈增加之势，出于投资目的购房者开始增加，大概占1/3，买别墅者也并不是少数。

有谁可以购买世界

“更强劲的消费还在后头。”喻文益说。他认为，经济发展带来了大量的资本聚集，这些资本都要寻求流通，最终都会导致对高端产品的大量购买。

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佩蒂斯评论说，房地产、艺术品、邮票、珍稀波尔多葡萄酒等，都在以创纪录的价格交易，这种情况通常是在流动性过剩的时期出现。

投资银行家出身的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贝姆认为，从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，日本也经历过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时期，

但后来增长逐渐放缓，到了1980年代中期，增长率只剩下5%~7%。银行的“大量超额贷款”人为推高了日本的经济增长率，也造成了1980年代末期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泡沫。当时日经综合指数几乎触及40000点，而20多年后的今天，日经指数已经跌破10000点。因此，中国经济的走向令人关注。

那些跟着资本一起流动的中国富人，在澳大利亚当地人中间，也引发了不同的声音。“有人觉得这些中国人会给城市带来新的活力，也有人认为中国人炒高了当地房价，增加了他们的生活成本。”陈忆说。

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和普利策奖获得者汤姆·弗里德曼则指出：“毫无疑问，中国的崛起与西方领军国家的停滞和瘫痪相重合，这带来了西方人心理上的不安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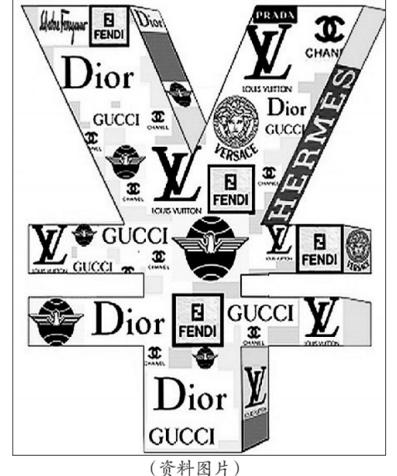
在欧洲，中国富人在伦敦和巴黎等地展现出的超强购买力，甚至有些人让人惶恐。法国媒体评论，富足的中国人“从企业、土地到港口、债务，无所不买”。英国的《经济学家》杂志也发表了“中国全面购买世界”的封面文章。

不过，戴利市长似乎不那么认为。他从美国出发前，有华人记者问这位即将到中国寻找投资的市场，是否会担心“中国购买美国”，或“中国购买世界”的情况发生。

市长觉得谈论“中国购买世界”为时尚早。他淡定地回应记者：“美国在世界各地投资，我们也没有买下世界。”

对于让海外讶异的“中国人的超强购买力”，喻文益认为，从统计学上来讲，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本流通和转移，必然带来各种优质产品的消费人群的增加。新兴经济体在高速发展时期，都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。

“不仅中国如此，俄罗斯、印度和巴西等国家，都在经历类似的情况，其实俄罗斯对奢侈品的消费比中国更厉害。”他对记者说。据《中国青年报》



(资料图片)

新闻时评

六万公车引发的三大落差

北京市财政局日前公布了全市公车数量——62026辆，不足人们预期的1/10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也在官网晒出2011年部门预算。不过，公众关注的“三公支出”从账本上不能直接看出来。(央视《新闻1+1》4月5日)

国家部委陆续晒账本，北京率先公布公车数量，从推进阳光财政的意义上看，无疑值得肯定。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问题迎刃而解，更不一定会得到公众的充分赞誉。那么，导致官方数据与民间感受落差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？

一是为谁公开。公开不是目的，公开是为了让别人监督，你的信息只有体现了客观情况，能够让别人看得清清楚楚，可以进行基本的对比分析，监督才有可能。北京公布公车数量，把统计口径放到了最小，只把党政机关的公车计算在内，这就不能算是“体现了实际情况”；财政部等部委晒出的账本，对于人们最关心的“三公消费”根本没有列出，这显然不能算“让人看得清清楚楚”。这样的公开，与其说是给监督者看的，倒不如说为了完成一件例行的公事。

二是谁来公开。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条规定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办公厅(室)，或政府确定的其他主管部门负责推进、指导、协调、监督本区域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在我看来，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条。北京的公车数量由财政部公布，这就几乎决定了数据的局限性——动用直接财政资金购买的才算公车。事实上，公车应该包括所有用公款购买的汽车，而财政局又不可能掌握所有的公车信息。这就需要有一个部门来出面协调、汇总所有公车信息，把靠谱的数据发布出来。

三是怎么办。公开政府信息，最忌讳把具体问题抽象化。“官话”与“百姓语言”历来是有距离的，机关里约定俗成的“语言范式”被公众准确、全面地理解，并不是很容易的事。因此，少一些繁冗，多一些“干货”；少一些概念，多一些白话，是公开信息时必须要注意的。做到这一点，除了端正态度，也需要创新。比如，“三公支出”从账本上看不出来，可能就有账本科目设置错位原因，这就需要做出有利于公众监督的改革。 马龙生

没有4000万身家的教授还要不要带学生

4月4日，北师大教授董藩发微博称，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，并对研究者提出要求，“当你40岁时，没有4000万身价(家)不要来见我，也别说是我学生。”对此，多数网民持批评态度，认为教师不应以金钱来衡量学生。部分网民则认为这是一种激励。(《四川在线》4月6日)

财富当然是衡量成功标准之一，但不是唯一标准。而“高学历者的贫穷就意味着耻辱和失败”的逻辑，更是不敢苟同。古今中外，不知道有多少大师一生清贫如洗，但贫穷的生存状态并不能遮掩耀眼的事业成就和人格光辉。左拉说“贫穷是一笔财富”，三千年前的孔子尚提倡“有教无类”，门下贫富皆存，但在董教授眼里贫穷却成了耻辱，以如是狭隘和市俗的价值观念来教书育人，不能不令人揪心。

如果按照董教授的这种逻辑，大抵有资格成为董教授学生的只有富人了——而且

也只能是那种合法致富发家的大商人，从事其他职业的事业无论再“成功”，想必难以拥有这么大的一笔财富。比如政府官员，纵然是主政一方的领导干部，若不贪污受贿，要拥有“4000万身家”也难如登天；再譬如董教授这样的学者和教师，就算是各种灰色收入，“4000万身家”怕也不容易。既然财富可以衡量学生，自然亦可以衡量教师。行文至此，笔者倒是想请教一下董教授“身家”几何，有没有达到4000万的标准。因为按照董教授的“成功标准”，没有4000万身家的大学教授也不能算是成功的，终究是一个“耻辱和失败”的教书先生。而一个“不成功”的教授，又怎么可能教育出“成功”的学生呢？由此而引申，大概凡是没4000万身家的大学教授都没有资格带学生，以免误人子弟耽误学生的前程。不需要上纲上线，“没有4000万身家

(家)不要来见我”本身就是一种财富逻辑，隐喻着教育功利的现实语境。“大学之大，并非有大楼也，乃有大师也”。在上世纪30年代，大批的国学大师在北大、清华等学府中“指点江山、激扬文字”，胡适、朱自清、沈从文、季羡林、金克木、邓广铭、张中行……但在近十几年来，大师已经绝迹。传统人文精神流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工具教育理性，大学成了就业的跳板，或者培养官员与商人的摇篮。基于这样的大背景，董教授的话才会这般理直气壮。社会现实价值观总是多元且具有短期性、易变性等特征，大学的价值观念由于受文化和历史沉淀的影响，具备摆脱短期功利狭隘性的特质，因此它可以制衡社会负价值的发展，担当起引领主流价值的作用。激励学生创富成才是没有错的，问题的关键在于，作为教育者，以“财富=成功”的功利标准去衡量学生，不仅有失师德师风，还悖于兼容并蓄、公平公正的大学精神。 陈一舟

药氏“激情”总能让人是非不分

“我要是他(药家鑫),我也捅……”这则网贴,语出药家鑫同门师妹李颖。(《重庆晚报》4月4日)

我很明白,说这话的人,没曾想过要为自己的言语负责,因而“激情发言”。她最后道了歉,只是说明她意识到“激情发言”是有代价的。然而,更多的时候,人们不必对自己的发言负责,因而这样的言辞并不少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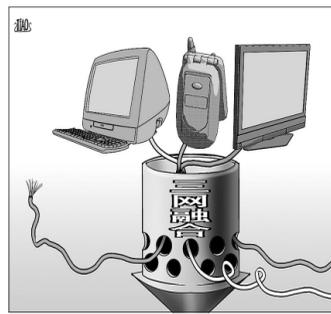
我也很明白,能说出这种激情话的人,想说出这种激情话的人,并非她一个。尽管是个案,但仍可管窥一豹。这个社会不合时宜的、多余的激情,时常借助着身体、语言的暴力,呈现了出来。

专家认为这是教育的失败,说明知识的灌输大过了人格的塑造。当药家鑫一案因为“激情杀人”的辩护词而引发热议,以至舆论分为两派时,我们的是非观是否需要教育?

如果真有失败,那是败在基础道德和基础价值。一个社会总有其基础道德,总有其价值根基,一旦失去之,难免走向“礼崩乐坏”的境地。于是,我们彼此不再尊重,我们用愤怒来思考,我们的激情出于理性,也因此而显得激情多余。当然,给这

个问题开出药方,那是相当大的工程,反正不仅仅是教育的作用,而教育本身也是这个社会基础道德、基础价值的传导罢了。我无意讨伐李颖,也无意替她辩护。她不过是药氏“激情”体现于网络言论的例子。一个是身体暴力的例子,另一个是语言暴力的例子,它们代表了这个社会激情的两端,是个案也是范本。当然,“激情”终究是个好听的词儿,说白了,当激情出于理性,自然向暴力转向,变成戾气。而我们身上的戾气,总在适时地试探这个社会文明的底线。

“我要是他(药家鑫),我也捅”,李颖如是说。李颖是为药家鑫开脱吗?当然不是,她不过是徒有激情罢了。我相信,也有人看见这则留言时,同样会说,“我要是看见药或者李,我也捅他(她)一刀”。这是在捍卫道德,守护公平吗?当然不是。这不过是戾气的自然流动,如同温度的传导一般。总之,如果没有共同信奉的价值,没有共同遵守的基础道德,这个社会就会溢出多余的激情,而激情总有其自我传导的方式,并让人们是非不分,以昂扬的姿态践踏一切碍眼的东西。 肖畅



三网融合或已夭折?

“我很久没被叫去开会了,三网融合恐怕已经夭折。”工信部电信科技委主任韦乐平的一句感慨,道出了三网融合目前的真实局面。让广电、互联网、电信这三个不同商业模式融合,以及让有公益性质的广电业和市场化的电信业竞争,本身就是无解的

好好活着 活得心安理得

在新民谣当中,我最喜欢的就是川子的歌,他有句歌词是“好好活着,就是最牛X的信仰”,这句歌词我很认同。

在我看来,好好活着,就是要活得心安理得。而何谓心安理得?大概就是用正常的手段赚钱,然后无愧地养活自己以及家人。当然,可能我们所说的心理安理得标准还与某些阶层有所差距,比如说最近有个新闻是说北京有个大学生(广州人哦),还是个美女大学生,她的某个视频在网上很有人气,主要是因为她做的是一份扛包的工作,用这个来养活自己(据《北京晨报》)。

之所以说这事儿可能与其他人的心理安理得有差距,是与另外一个人作为对比而言的。那个人是某个地方的官员,他被抓住以后说得也挺理直气壮的,他说:“要是说我贪腐,那每个官员都跑不了。”您看,这就是他们的人生观,与这位美女大学生比还是挺有差距的。人家觉得心安理得地赚钱吃饭,哪怕是社会觉得不该是个大学生所应该从事的工作,也很正常,有些人觉得在贪腐的路上如果差了别人一步那就是不够心安理得,其中差距恐怕就不可以用同一个标准衡量了。

有人提醒我说,说不定过几天就会有人宣称,这又是某些人利用网络进行炒作的一个事件而已,并非是一个美女大学生真的拥有这样的价值观。这个确确实实要警惕,毕竟好多人都是靠这个出了些一时的名头,然后让人们对于心安理得赚钱这件事有了另外一种认识,觉得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为了更大利益的炒作。

但我决定还是不管这种担心,而是把这种行为看做是一种真的发自内心的话来评论。这是因为胡适先生说过: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,对人在有疑处不疑。这个世界已经有太多可以让我们疑惑的东西了,哪怕是别人再怎么觉得可疑,也要用不怀疑的态度来对待这种行为。道理很简单,这种行为是对的。

这些年来,我们的道德基础之所以被破坏有两个原因:一个是没有一个正反馈机制来奖励最起碼的善;另一个是过多地宣扬了已经成码的恶。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,做事不择手段。没有人会追究一个人成功之前做过什么,而成功之后更多人为了他们成功涂脂抹粉,更多的人为这些成功所收买,为了这些成功的成功而文过饰非。那么多这样的成功者告诉我们一个最现实的道理:所有的罪恶其实都是可以原谅的。

那么,我个人是愿意相信这种最起碼的心安理得,并且觉得这是作为一个正常人应该具有的准则,因为我等良心尚存的人,还是需要看到这个世界有自己同类的,虽然有时候也告诉自己,即使没有也不能堕落到某些人的地步,但是有的话,这个世界就多少还有一种吾道不孤的温暖在这里,同时希望这样的人能够好好活着,是我们认同的、最牛X的信仰。 散人